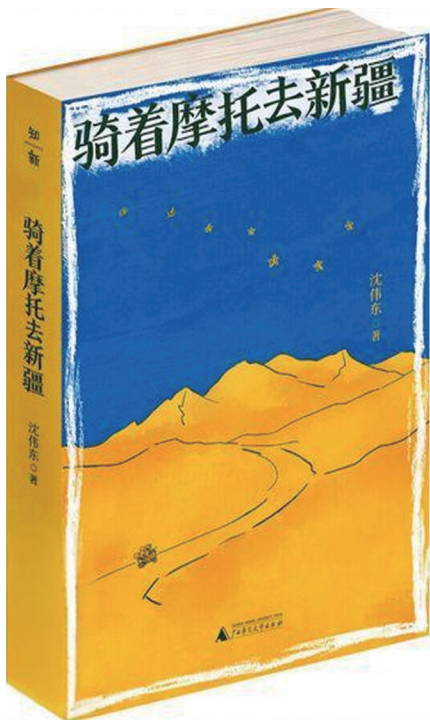


一场意义深远的红色教育之旅

——读《骑着摩托去新疆》



在当代旅行文学的谱系中，沈伟东的《骑着摩托去新疆》并非单纯的风景区行或亲子游记。这部作品以中国大地为课堂，将横跨数省的旅途与中国革命、建设的壮阔历史深度交织。从甘肃会宁的红军会师塔到新疆乔尔玛的烈士陵园，从川陕公路的抗战记忆到西路军的征战遗迹，作者带着读小学的女儿冒念青，用车轮丈量红色热土，用脚步触摸历史痕迹，完成了一场别开生面的红色教育之旅。作品通过细腻的场景描写、真实的历史溯源与深刻的现实观照，不仅展现了红色旅行在个体生命成长中的重要价值，更论证了红色文化传播与革命精神传承的当代意义，为新时代红色教育提供了生动范本。

红色教育的本质，是让抽象的革命精神转化为可感知、可共情的生命体验。对于年幼的冒念青而言，“红军”“长征”等词汇曾是课本上模糊的概念，而甘肃会宁的红军会师塔，则让这些概念有了具象的载体。当摩托车驶入会宁县城会师镇，“中国工农红军第一、二、四方面军会师纪念碑”的鎏金大字映入眼帘。这种视觉冲击带来的记忆锚点，远比书本说教更为深刻。

作者没有堆砌历史数据，而是以父亲的口吻，用最朴素的语言为女儿解答“红军是干啥的”：“为了拯救老百姓拯救国家，甘愿付出一切的那群人——他们甚至甘愿付出生命。”这句简明的阐释，道出了长征精神的核心。在会师塔下，冒念青仰脸凝望的姿态，成为红色教育最动人的注脚——她或许无法完全理解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艰辛，却能从纪念塔的庄严肃穆中感知到英雄的分量；她或许记不住复杂的会师细节，却能在父亲的讲述中，将“红军”与“民族英雄”的形象牢牢绑定。

会宁会师作为长征胜利的重要标志，是中国革命史上的里程碑事件。作者通过亲子互动的视角，让长征精神从宏大的历史叙事落地为个体的情感共鸣。这种教育方式打破了传统红色教育的说教感，让孩子在现场氛围的熏陶中，自然而然地接受初心启蒙。当摩托车驶离会宁，会师塔的身影逐渐远去，但“拯救国家、甘愿牺牲”的信念，已在小冒心中埋下种子。这种具象化的红色教育，远比课堂讲授更具穿透力，它证明了红色精神的传承，需要以真实的历史场景为依托，让年轻一代在与历史的对话中汲取力量。

如果说会宁会师塔承载的是长征精神，那么广元段的川陕公路，则镌刻着中华民族抵御外侮的抗战记忆。当摩托车沿着“嵌入绝壁的绳索”般的旧川陕公路行驶，崖壁上深浅不一的凿痕、危石欲坠的“穿岩路”、嘉陵江畔的“老虎嘴长廊”，都在无声诉说着这条道路的艰险。黑胡子大货车司机的讲述，为这段旅程注入了厚重的历史内涵：“打日本的时候，川军就是从这条路出川的。”简单的一句话，将眼前的山路与八十多年前的烽火岁月紧密相连。

作者没有停留在对川军出川的笼统叙述，而是通过细节勾勒与历史溯源，展现了川军的悲壮。据史料记载，抗战八年，300多万川渝将士义无反顾走上前线，64万余人伤亡，参战人数与牺牲比例均居全国之首。他们身着单衣、脚穿草鞋，手持简陋的川造步枪，从这条险峻的川陕公路出发，徒步数千里奔赴山西、上海、南京等战场。台儿庄战役中，王铭章将军率部死守滕县，3000余名将士全部壮烈牺牲，用血肉之躯为战役胜利奠定基础；安县农民王者成送子出征时，赠以“死”字旗，上书“伤时拭血，死后裹身”，成为川军爱国情怀的生动写照。这些历史细节与眼前的川陕公路相互印证，让冒念青直观感受到：所谓英雄，正是在国家存亡之际挺身而出的普通人。

在当前复杂的中日关系背景下，这种抗战精神的传承更具现实意义。当小冒在川陕公路上看到当年筑路的凿痕，听到川军出川的故事，她所理解的“爱国”，已不再是抽象的口号，而是具体的行动——是危难时刻的挺身而出，是平凡岗位上的坚守奉献。这种从历史中汲取的家国担当，将成为她生命成长中不可或缺的精神养分。

红色教育不仅要传递胜利的荣光，更要展现革命历程中的艰辛与牺牲。《骑着摩托去新疆》对红西路军遗迹的探访，便呈现了这种悲情英雄主义的深刻内涵，让红色教育更具厚度与深度。当中泉镇山壁上“红西路军尾泉战役遗址”的大字闯入视野，一场跨越时空的历史对话就此展开。

尾泉村的泉水潺潺流淌，半坡上坑坑洼洼的壕沟是当年红军构筑的军事工事，村民口中“用兵如神、大获全胜”的传说，与作者通过手机搜索得知的“惨烈征战史”形成鲜明对比。这种差异并非矛盾，而是历史记忆的不同维度——村民们铭记的是红军为保卫家园展现的英勇，而历史记载的是西路军孤军奋战的悲壮。据党史资料记载，1936年会宁会师后，西路军西进途中遭遇强敌，无根据地依托、无物资补充，经过四个多月艰苦奋战，最终失利，仅李先念率领的400余人历尽艰险抵达星星峡。幸存者回忆，他们在戈壁中形同乞丐，换下的褴褛衣衫烧起来噼啪作响，那是虱子被烧焦的声音。这些细节让冒念青明白，革命胜利并非轻而易举，英雄主义不仅体现在胜利的欢呼中，更彰显于绝境中的坚守。

星星峡的“西部军魂”雕像与乌鲁木齐人民公园的丹凤阁，构成了西路军精神传承的完整链条。警官姐姐带领冒念青瞻仰雕像时，让她印象深刻的是“这400多红军走过的路，也正是她和爸爸从尾泉村一路骑行经过的路线”。这种空间上的重合，让历史与现实产生强烈共鸣——当年红军徒步穿越的荒漠

戈壁，如今成为摩托车可以驰骋的公路，但不变的是那份穿越艰难险阻的勇气。丹凤阁作为西路军战士曾居住过的地方，如今成为市民休闲娱乐的场所，孩子们在回廊间捉迷藏，市民在阁前跳新疆舞。这种宁静祥和的场景，正是对西路军烈士最好的告慰。

红色精神并非仅存在于革命战争年代，更传承于国家建设的伟大实践中。《骑着摩托去新疆》对独库公路的探访，将红色教育从革命历史延伸到建设时期，展现了“艰苦奋斗、无私奉献”精神的时代延续。当越野车驶入乔尔玛，雪山草原间的独库公路蜿蜒伸展，这条被誉为“天山景观大道”的公路，背后是一段可歌可泣的建设史。

作者通过详实的细节，还原了独库公路建设的艰苦卓绝：1974年动工，10年间数万军人参与建设，翻越4座冰达坂，穿过高山永冻层，跨越近10条河流，168名平均年龄不到25岁的年轻军人献出了生命。乔尔玛革命烈士纪念馆里，泛黄的老照片、磨得发亮的铁锹、裂缝的藤制安全帽，这些实物比任何文字都更具冲击力，让作者和小冒对“不畏艰辛的民族精神”有了直观感受。

独库公路的建设精神，是革命精神在和平年代的生动延续。如果说红军长征是为了民族独立，川军出川是为了国家存亡，那么独库公路的建设者们，则是为了国家发展、民族团结而奉献。他们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中开山劈石，用青春和生命打通了南北疆的交通要道，这种“艰苦奋斗、无私奉献、团结协作、勇于创新”的精神，与长征精神、抗战精神一脉相承。当小冒行驶在平坦的独库公路上，欣赏着雪山草原的美景，她能真切感受到：今天的幸福生活，不仅是革命先烈用鲜血换来的，也是建设者们用汗水和生命铸就的。

《骑着摩托去新疆》的红色教育叙事，最鲜明的特点是“知行合一”。作者没有将红色教育局限于遗址参观，而是通过亲子同行的方式，让孩子在“走、看、听、思”的过程中，完成精神的成长与蜕变。

对于小学生而言，课本上的革命历史往往是枯燥的时间、地点、事件，而亲身走过红军会师的会宁、川军出川的公路、西路军征战的遗址，就让这些历史有了可触摸的载体。冒念青通过仰望会师塔、抚摸川陕公路的凿痕、瞻仰烈士墓碑，将书本知识与现实场景结合，形成了更深刻、更持久的历史记忆。

从更广阔的社会意义来看，《骑着摩托去新疆》的红色叙事，为新时代红色文化传播提供了有效路径。在信息爆炸的今天，年轻一代接触的文化多元复杂，传统红色教育方式面临挑战。而这部作品以旅行文学为载体，将红色文化融入亲子互动、风景描写、历史溯源中，让红色教育变得生动、有趣、可感。它证明了红色文化的传播不需要刻意迎合，而是要找到合适的载体，让革命精神自然地走进人们的心灵。

《骑着摩托去新疆》的红色之旅，是一场跨越时空的精神对话，更是一次意义深远的生命教育。从会宁会师塔到独库公路烈士陵园，从川陕公路到西路军遗迹，车轮碾过的不仅是中国大地的广袤山河，更是红色历史的厚重年轮。作者带着女儿冒念青，用脚步丈量历史，用心灵感受精神，完成了一次从认知到情感、从品格到信念的全面成长。

据《中华读书报》作者：赵勇富

一场守护非遗的纸上苦旅

——读汪帆《寻纸》

提及中国传统的纸，大家会想到哪些种类的纸呢？第一反应大概是宣纸，练习书画的朋友可能还会知道毛边纸。但当你读完了汪帆老师的《寻纸》这本书，便会明白，原来我们所熟知的这些纸张，只是中国传统手工纸的冰山一角。

汪帆老师是浙江图书馆的一名古籍修复师，因修复用纸需要，她遍寻中国传统手工纸的生产地并记录成文。书中收录了13个省、自治区的25种实物手工纸样，这本《寻纸》是抒情的游记，也是纪实的风物志；是一场古籍修复师的“文化苦旅”，也是一部中国造纸的《天工开物》，更是一幅描摹当代中国传统手工纸制造业的生动画卷。书中的每一篇文章都紧扣一个“寻”字——寻的是纸，更是人，是那份在时代洪流中弥足珍贵的坚守。

她的记录兼具史家的严谨与文人的诗意。在描写墨玉桑皮纸的制作时，她细致入微地写道：“把煮熟的桑皮料放在一块半圆形的石板上，剔除杂质后，用一种柄短头大的木槌敲砸……待桑皮料被砸成饼状，颜色呈黄白色才算完成。”制作程序、所用工具、效果呈现等都描写得极为细致，仿佛在书写一段严谨的史料。而当她描绘鹤庆棉纸的揭纸场景时，文字又充满了灵动的美感：“落日余晖中，揭纸的铮铮之声宛如乐章，扬起的细小纤维在最后一丝阳光下翩然飞舞。”这样的文字是有温度的，能让我们体悟到汪老师内心对于手工造纸那份情有独钟的浪漫情怀。

汪帆老师的角色远不止于记录者。作为一名专业的古籍修复师，她是这些手工纸最懂行的“甲方”。她会站在纸槽边长久观察，凭借专业直觉发现问题，并与造纸师傅共同探讨工艺改进之道。这种深度参与，使她的思考超越了单纯的怀旧，直指传统工艺存续的核心命题。

书中关于丹寨构皮纸的篇章让人感触颇深。这项古法造纸已于2006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，并为贵州茅台酒厂提供窖藏密封纸，证明了传统手工纸在书画、古籍之外仍有广阔的实用价值。文中提到，当地品质最佳的纸产自“穿洞”之中，其独特水质是无法复制的关键，这恰恰彰显了手工纸“天人合一”的独特魅力。然而，汪帆老师也清醒地揭示了非遗传承的困境。她在书中写道：“当我们轻松地掂着他们生产的纸张品头论足时，王师傅却正在为自己的生计努力摸索、拼搏。”无论是日复一日的辛勤劳作，抑或是纸坊中供奉着的那一尊尊蔡伦祖师的牌位，都体现着造纸手艺人内心的坚守，然而若坚守无法转化为实际的效益，“酒香也怕巷子深”，这样的传承是不可持续的。值得欣喜的是，一些手艺人已在积极探索出路，如开发文创产品、开设造纸体验中心等，这些都是有益的尝试，但就书中所述的现状来说，我们对传统手工纸的关注还远远不够。

《寻纸》一书的价值，正在于它让这些深藏于“深山老林”中的非遗瑰宝走进了大众视野。这本书，是对中国手工造纸技艺的一次深情回望，也是一声面向未来的呼唤。它让我们看到，在数字化浪潮中，一张温润的手工纸所承载的，不仅是文字与图画，更是一个民族的文化记忆与匠心精神。

这本书的气象是宏大的，正如国家图书馆张志清馆长所评价的那样：“这本书会牢牢锁住我们的心灵牵挂，让我们不断感受文化遗产带来的震撼，思考关于人类命运的话题。”希望能有更多的读者翻开这本《寻纸》，跟随汪帆老师一同开启一场“寻纸之旅”，在阅尽此书后，细细地触摸她亲自带回的那些珍贵纸样，感受其中所承载的匠心与传承，让非遗手工纸事业薪火相传。

赵维宁